

WEI LE WANGQIE
DIE JINIAN

ZHONGGUO KANG
ZHAN CHONGQING
LISHI DIWEI YAN JIU

张国镛 陈一容 著

为了忘却的纪念

——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为了忘却的纪念

——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

张国镛 陈一容 著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为了忘却的纪念: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

张国镛 陈一容 著

责任编辑:富治平

封面设计:文沛霖

出版发行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(重庆·北碚 邮编 400715)

(网址:www.xscbs.com)

印刷者: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16.25

字数:410千字

版次:2005年11月 第1版

印次:2005年11月 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5621-3553-3/G·2246

定价:28.00元



张国镛 男，1959年12月生，重庆市长寿区人。西南大学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重庆市党史学会副会长、重庆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会秘书长、重庆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、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、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”研究员。1980年起先后就读和进修于西南师范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等，获历史学学士学位、法学硕士学位。先后在空军雷达学院、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任教并担任西南师范大学马列基础部副主任、经济政法学院副院长、政法学院副院长等职务。出版专著《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专题研究》、《三代领导核心关于现代化建设思想比较研究》、《经营谋略学概论》、《重庆国民政府》、《民国史纪事本末》(第六卷)等10余部，主编教材《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专题解读》、《邓小平理论概论》、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》等10余本，在《近代史研究》、《抗日战争研究》、《史学月刊》、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》、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》(文)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。先后被评为四川省、重庆市普通高等院校“两课”优秀教师、西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等。主持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等三项；先后获重庆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、重庆市教委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共4项。



陈一容 女，1961年4月生，四川省大竹县人。西南大学副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教研室主任。1980年起先后就读和进修于西南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，获历史学学士、硕士学位。先后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抗日战争研究》、《史学月刊》、《文史杂志》、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》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篇，文章先后被《新华文摘》、人大复印资料《中国近代史》、《历史学年鉴》等转载或复印。合著《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专题研究》、《近代人物与区域研究》、《重庆国民政府》、《新中国的历程》、《于右任在重庆》等专著。

自序

“但凡爱国之心，人不可不有，若不知本国文字、历史者，即不能生爱国心也。”这是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说的。这句话用在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义。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，我们不能忘记 60 年前那场血与火的战争，一场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给中国人民、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。以史为鉴，可以明兴替。笔者将这部汇集了自己及同仁前后近十多年研究心血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——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》奉献给广大读者，是很有意义的，就是要激起大家的爱国心。

记得我国大文豪鲁迅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写过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这个题目。笔者小的时候学习过，当时印象特别深刻。如今，借此题目来为自己服务，为历史和现实服务，应该不存在什么侵权之嫌吧！

鲁迅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，笔者是为了纪念中国抗战。但我们都不是为了忘却，而是为了纪念。

60 年前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，英勇奋斗，终于战胜了疯狂野蛮的日本侵略者，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、团结振兴以及人民的自由解放富裕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60 年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曾经满目疮痍、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曾经备受凌辱、历尽磨难的中华民族正以独立自主、自信自强的崭新形象屹立于当今国际舞台，在

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意气风发地开创未来。

60年过去了，当我们重新审视抗日战争这段峥嵘岁月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，是她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，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，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；是她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；是她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，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；是她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，领导和开辟了广阔的解放区战场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；是她体现了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、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。

6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应该思索：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，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，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，能够挽狂澜于既倒，推动和领导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，并取得最后胜利？这是因为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党，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，顺应时代进步要求，为中国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确道路，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途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、大公无私的党，总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与人民群众心连心，甘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、独立和振兴而不懈奋斗，激励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，使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的党，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，永不自满，永不懈怠，永葆生机和活力。

回顾历史，我们不能不怒气冲天、感慨万千；面对现在，我们不能不热血沸腾、豪情万丈；展望未来，我们不能不雄心壮志、意气风发。我们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启示，寻找动力；从现实中去寻找目标，去寻找信心，去开拓发展机遇和空间；从未来中去寻找答案，去

寻找成果。

抗战时期的中国，不仅是世界最早的反法西斯国家，而且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国家，其间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，直到日本法西斯最后投降为止，时间长达 14 年。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，1940 年以前，抗击着全部日本法西斯侵略军，有效地延缓了日本侵略者的北进苏联和南攻英美，为苏联和英美等同盟国反击法西斯赢得了时间。即使是 1940 年特别是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后，中国军队仍然抗击着 2/3 以上的日本侵略军，直到日本投降。日本投降时，在中国的军队仍然达到了 2/3 以上。可见，在 14 年抗日战争中，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的。

抗战时期的重庆，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，还在于它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，还在于军事上的坚持对日抗战，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乃至热血与生命，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的基础。没有抗战，就不会有重庆战时陪都，反之，没有战时陪都重庆，中国的抗战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。

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，理由不止一端。其中最根本的是这段历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、在近现代战争史上、在中国革命史上、在中国共产党史上、在中国国民党史上、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只需回顾一下过去，事情就可以显得很清楚。历史就是那么巧合，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，正值甲午战争失败 110 周年。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，共 50 年时间，其间有日本参加或发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、日俄战争、济南事变、皇姑屯事变、九一八事变、热河事变、华北事变等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没有取得胜利，相反却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沉沦。在中国，先进的志士仁人在探寻中国的出路，

在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，其间也有戊戌变法运动、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、辛亥革命运动、五四爱国运动等等。然而，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，似乎并没有彻底搞清楚，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，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。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，就是要牢记历史、不忘过去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。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，抓住机遇，奋发图强，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。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、发展、合作的旗帜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，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，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。

笔者对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的研究，始于15年前。1990年8月，重庆市历史学会有一些老同志，他们经常一起协作攻关，撰写出了《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》等专著。笔者有幸成为他们培养的对象，不仅参与其中，而且还受到他们的重用。1993年10月，由重庆市政协、重庆市党史学会、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、重庆陪都史研究会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，重庆大学主办，重庆钢铁集团总公司协办，召开了中国首届“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笔者的文章不仅入选，而且还在大会上进行发言。1995年，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，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决定编撰一套反映重庆抗战的丛书。初定15本，后来增加1本，变为16本。其中笔者和杨光彦（当时为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，历史系教授）、陈明钦（马列部主任）等接受了《重庆国民政府》的编写任务。经过艰苦努力，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，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。1997年，笔者与杨光彦教授一起，又得到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主持的辽宁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“民国史记事本末”（七卷本500万字）有关《抗日战争时期》下册的编撰任务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，也圆满完成了任务。自那以后，笔者并没有放松在这方面的思考，相继写了一些文章。

重庆抗战历史地位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和之后又有较大变化。改革开放前,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几乎被视为“禁区”。改革开放后,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坚持“以史为鉴”,坚持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对过去视为“禁区”的抗战历史特别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开始逐步涉猎,开辟了许多研究新领域,涌现出了一些专家学者,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,繁荣了史学舞台。

这种繁荣并没有结束,本书就是这繁荣的万花园中的一朵小花。

2005年5月

目 录

自 序	(1)
绪 论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	(1)
一、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	(2)
二、中国社会政局的转变	(6)
三、中国社会各阶级、阶层关系的分化	(9)
四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	(14)
五、从“千古罪人”到“千古功臣”	(17)

上 编

第1章 重庆：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	(23)
一、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	(23)
二、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	(39)
三、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发展	(50)

第2章 重庆: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	(57)
一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	(57)
二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建立	(63)
三、打下外交工作的基础	(66)
四、创立红岩精神和影响陪都文化	(76)
第3章 重庆: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舞台	(87)
一、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组织与形式	(87)
二、协商谈判:国共合作的具体途径和形式	(98)
三、军事上相互支持相互沟通	(135)
第4章 重庆:周恩来外交谈判的“练兵场”	(141)
一、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实践	(141)
二、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艺术风格	(153)
三、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理论经验	(163)
第5章 重庆: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	(169)
一、各民主党派的建立	(169)
二、促进中国团结抗战	(183)
三、促进民主宪政运动高涨	(187)
第6章 重庆: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阵地	(195)
一、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建过程	(195)
二、台湾革命同盟会统一的原因	(200)
三、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工作	(203)
四、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结束	(214)

下 编

第7章 重庆:战时中国军事指挥堡垒 (219)

- 一、中国军事机构所在地 (219)
- 二、在重庆举行的军事会议 (233)
- 三、在重庆组织的大会战 (245)

第8章 重庆:远东战场的军事指挥基地 (263)

- 一、重庆在远东军事地位的确立 (263)
- 二、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 (270)
- 三、中国远征军征战滇缅 (285)

第9章 重庆:战时中国的外交平台 (297)

- 一、争取国际对华援助 (297)
- 二、加强国际合作 (314)
- 三、拓展中国国际新形象 (328)

第10章 重庆:美国总统特使的实验地 (357)

- 一、抗战后期罗斯福派来重庆的特使 (357)
- 二、纳尔逊与中国战时生产局 (363)
- 三、赫尔利的使华及其助蒋反共 (383)

第11章 重庆:战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 (403)

- 一、战时重庆经济结构的变化 (403)
- 二、战时重庆工业的外引内联 (409)
- 三、抗战时期重庆交通运输业外引内联 (430)

第12章 重庆:战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 (447)

一、战时重庆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(448)

二、关于战时迁渝高校的数量问题 (451)

三、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内联外引 (464)

结束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策略 (479)

..... (479)

一、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 (479)

二、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 (483)

三、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(489)

主要参考书目 (493)

后 记 (500)

绪 论

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

20 世纪 30 年代,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,中国、远东乃至世界的局势激烈动荡。此间,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,围绕着摆脱民族危机的中心,不断调整。然而,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制止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。考察此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政策变化的动因和轨迹,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,有利于加深对这一阶段总体政策及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研究,已经从一些具体的单方面的研究,发展到了多层次的综合性的研究,取得了颇丰的成果。其中有专著《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》、《九一八事变研究》、《西安事变研究》、《西安事变研究新论》等;论文方面更是不计其数。但是,在这些研究中,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内在联系的研究尚不多见。有鉴于此,笔者拟从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间中国社会各种关系等方面入手,来研究这两个历史变变的内在联系,并企望能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和拓展。不妥之处,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。

九一八事变,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侵占中国东北地区,进而侵占全中国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反动事变。西安事变,是在中国民族矛盾激化,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,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发动的旨在促蒋(介石)反省、联共抗日的爱国事变。两个

事变，一反一正，相反相成。毛泽东曾说：“我们中国人常说：‘相反相成。’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。这句话是辩证法的，是违反形而上学的。‘相反’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，或互相斗争。‘相成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，获得了同一性。”^①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，就是“相反相成”的，它们之间既是“相反”的，但又是“相成”的即相联系的。对于它们的“相反”一面，学术界似乎已经研究得很全面，而对它们的相联系的一面，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正是基于此，笔者拟就两者的内在联系作一论述，一则为了纪念张学良、杨虎城等“民族英雄”，二则借此来拓展研究领域。

一、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

九一八事变后，中日民族矛盾趋于尖锐，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，最初以消弭矛盾、平息事端为主要诉求。此后，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，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的基点，外交上发生了引人瞩目的重要转变。综观西安事变前的几年间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的变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从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止，对日不予抵抗，企图依赖国际联盟的调解。九一八事变前，日本侵略者曾相继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，种种侵略迹象已引起中国人警觉，但此时的蒋介石，正集中主要精力于江西“围剿”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，无暇北顾，唯愿对日妥协了事。1931年9月12日，蒋介石密电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：“此非对日作战之时”^②，表明了他对日本的基本态度。事发时，东北军奉命未放一枪一弹，撤离沈阳，

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333页。

② 吴相湘著：《第二次中日战争史》上册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，第84页。

张学良并声称：“无论日方如何压迫，始终持不抵抗主义。”^①“不抵抗主义”一词反映了蒋介石政府此阶段对日政策的本质。事变发生后，国民政府一方面逆来顺受，力求以容忍的姿态杜绝日本侵略的口实；一方面专门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，由戴季陶执掌，开展诉诸国联的外交斡旋。此机构刚一成立，戴季陶即抱定妥协的对外策略：“第一，无论如何，决不先对日宣战。第二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好感。第三，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。但至万不得已，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，亦所不恤，仍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代价。”^②依据这种对外策略，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展开了频繁的申诉活动。然而，及至年底，国联理事会虽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问题数次作出决议，但这些决议既无力制裁日本，给予中国切实的帮助，也没有谴责日本，给予中国道义上的声援。就在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的过程中，东北三省次第沦陷。这一阶段，南京国民政府内出现过一次重大权力波动。1931年12月15日，蒋介石被粤方实力派逼迫下野。孙科、陈友仁北上南京组阁。孙陈内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政府。由于蒋介石暗中操纵政局，它前后只维持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里，新政府虽然向日本宣战，奉行对日强硬外交，可强硬的背后缺少章法、谋略和有力的支持者，难有作为。

第二阶段：从一二八事变至1935年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止，“一面抵抗，一面交涉”。1932年1月下旬，蒋介石和汪精卫相互妥协，再度携手执政。一二八事变后，蒋汪联盟提出了“一面抵抗，一面交涉”的对日方针，即：“军事上要抵抗，外交上要交涉，不失领土，不丧主权，在最低限度之下，我们不让步；在最低限度之上，我们不唱高调，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。”^③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方针，一方面以有限的抵抗缓解国内的抗日情绪，另

① 《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》，第17辑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53页。

② 陈天锡著：《戴季陶（传贤）先生编年传记》，台湾文海出版社，第121页。

③ 《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》，第18辑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42页。